

# 二十世紀敦煌學的回顧與展望

## —臺灣篇

### Dunhuang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 Taiwan

鄭 阿 財 (Cheng A-tsai)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敦煌學是以資料為核心的學科，而研究發展的主要關鍵即在於資料。臺灣地區敦煌學的研究概況，也是和敦煌資料的流通息息相關。就臺灣地區收藏的敦煌卷子而言，國家圖書館（原中央圖書館）、國立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以及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加上私人所藏，總計不過二百多卷，且多數係佛經卷子，對研究而言，條件並不很充分。雖然如此，但臺灣地區的敦煌學研究成果，卻是相當豐碩而可觀的。

1947年臺灣大學即出版了日本神田喜一郎編的《敦煌秘笈留真新編》，此書原為日本帝國大學神田喜一郎教授於留法期間拍攝的伯希和藏卷中的四部要籍。在初期，除此之外可資研究的材料實在有限。因此，有關研究實際多為大陸時期的延續。如蘇瑩輝在「瓜沙史事」方面的研究，主要即以其在大陸時期的研究為基礎。蘇氏原任職四川重慶中央圖書館，1943年前往敦煌藝術研究所工作，1949年至1965年任職臺北中央圖書館。

1954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經由日本取得一套英藏微卷沖洗的照片，使得臺灣地區可資研究憑借的材料逐漸增多。1955年大陸的任二北出版了《敦煌曲校錄》，臺灣地區楊家駱主持世界書局編輯，特將它附在任大椿《唐五代詞》後出版；1957年大陸的王重民等出版了《敦煌變文集》，世界書局也將其改名《敦煌變文七十八種》在臺印行；1956年旅美的巴宙在英倫抄錄了一百多件佛教詩歌、佛曲歌讚，在臺出版了《敦煌韻文

集》。這些都提供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材料。由於多屬文學性質，因此引起各大學中文系的關注，而陸續出現了變文、曲子詞等有關的學位論文。如：邱鎮京《敦煌變文論述》、邵紅《敦煌石室講經文研究》、謝海平《講史性變文之研究》等。特別是羅宗濤的《敦煌講經變文研究》是第一本以敦煌學研究的博士論文，帶動了大學院校敦煌文學的研究風潮。

1973年潘重規從香港新亞學院退休，在法國巴黎大學客座，應當時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極力邀請，回國擔任文學院兼中文研究所所長，開始在臺灣極力推動敦煌學的研究。為期許「漢學終當作漢聲」，因而編纂了第一本「敦煌學」的專門刊物；購買英、法所藏的「敦煌微卷」、增添「閱讀影印機」設備；組織「敦煌學研究小組」；開設「敦煌學研究課程」積極培養研究人才。艱苦卓絕的努力，打下臺灣地區敦煌學研究的厚實基礎，開墾出臺灣地區敦煌學研究的另一片園地。

80年代後，拜科技發達之賜，敦煌資料的流通逐漸普遍。1981年，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14輯140冊陸續印行（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1986）。英、法、北京所藏敦煌寫卷影本，方便披閱，促使研究環境快速提昇，敦煌學研究也開始跳脫抓吃式個別寫卷的研究方式，而步入專題式的研究。90年代以來，潘重規教授培養的弟子已皆有成，各自持續發展。此時更逢資訊發達，各國寫卷大都進行影印出版，以廣流通，且因科技

先進，所見寫本尤為清晰；加以兩岸敦煌學界的頻頻交流與激盪，研究領域漸為開闊。研究也應用電腦資料處理，進入較大規模的專題研究，並進行全面系統性的處理。臺灣地區敦煌學的研究者遽增，研究面擴大，研究成果也頗有可觀。回顧 1949 年以來臺灣地區敦煌學的研究概況，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主要項目：

目錄的編纂：在寫卷目錄方面，有關臺灣的藏卷目錄，最重要的是潘重規 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1968，1975 修訂），此篇係首次將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所有敦煌寫卷加以詳細敘錄。披露後旋即引起學界關注，紛紛遠道來臺，披閱原卷，撰文論述。其次是鄭阿財 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將長久以來罕為人知的傅斯年圖書館藏 49 件敦煌寫卷，詳加敘錄，提供學界參考。有關各國藏卷目錄，主要有黃永武《敦煌遺書最新目錄》（1986）此錄係配合《敦煌寶藏》而編，並附有俄藏簡目，是目前著錄敦煌寫卷目錄較廣的工具書。釋禪觀《敦煌寶藏索引》（1996）則是根據黃氏目錄編製索引，頗便於尋檢。其他尚有金榮華主編《倫敦藏敦煌漢文卷子目錄提要》（1993），是書蓋為補英 翟理斯（Lionel Giles）所編之目錄不足而編。另外江素雲《維摩詰所說經敦煌寫本綜合目錄》（1991），則為專經目錄。

研究論著目錄方面，主要有鄭阿財、朱鳳玉編《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987），收錄 1908 年至 1986 年間中日兩國有關敦煌學的論文著作，含專著、論文及學位論文，共計論文 4381 篇，專著 506 種，分為十二類，後附作者索引。2000 年更增補新編，出版了《1908-1997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2000），收錄範圍涵括西元 1908 年至 1979 年間，海峽兩岸、日本及東南亞地區學者之研究成果，總計收錄敦煌學研究相關專著、期刊論文、學位論文等相關論著 11650 筆。蒐羅豐富，分類亦細。尤其與漢學中心合作，將全書彙整成《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資料庫》，提供全文檢索、類目瀏覽、關鍵詞查詢、作者、書篇名、期刊論文集名稱索引瀏覽等網路檢索，極便學界。此外，鄭士元《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987）則收錄期限為 1899 到 1984 年。至於專題論著目錄方面，則有鄭阿財、朱鳳玉 1977-1997 年臺灣敦煌文學研究論著目錄（1997）。

總論：主要有金榮華的《敦煌文物外流關鍵人物探微》（1993）針對致使敦煌寫卷外流散失的關鍵人物斯

坦因、王道士、汪宗翰、潘震、蔣孝琬等人，加以評騭探究。林聰明的《敦煌文書學》（1991）論述了解讀敦煌文書有關的問題，包括寫卷形態、外觀、種類、抄寫身分、紙張等等，條析理分並舉實例提示解讀要點，減少初學者摸索之苦。

語言文字：臺灣地區敦煌學在俗文字方面的研究，可說是開風氣之先，也是最具特色的。主要為潘重規的系列論著。首先是潘先生主編的《敦煌俗字譜》（1978），歸納敦煌俗字編為字譜供作解讀敦煌寫本之工具。其後更發現遼行均編的《龍龕手鑑》一書，係根據寫本編纂而成的字書，其所據文字正與敦煌寫本同，均是俗寫文字之淵藪，因此此書正是校讀敦煌寫卷的最佳工具。為使便於翻檢，主編《龍龕手鑑新編》（1980）成為解決敦煌寫本文字障礙不可或缺的工具書。同時更為敦煌俗字研究發凡起例，如 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1980），便是有鑑於敦煌寫本文字存在字形無定、偏旁無定、繁簡無定等紊亂現象，造成讀卷人莫大的困擾；特將個人數十年披閱寫卷，解讀文書的經驗，分析卷中俗、訛、繁、簡等複雜問題，歸納出字形無定、偏旁無定、繁簡無定、行草無定、通假無定、標點符號多異等條例，並列舉變文、曲子詞等敦煌俗文學寫卷的書寫文字相互印證，說明敦煌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關係，成為研究敦煌俗文學必備的條例。此外，王三慶 敦煌寫卷中武后新字之調查研究（1986），則是利用敦煌寫卷全面探討武后新字。而關於字樣學的則有鄭阿財 敦煌文獻與唐代字樣學（1995）、蔡忠霖《敦煌字樣書「正名要錄」研究》（1994）。

有關字書的研究，主要有朱鳳玉的 敦煌文獻與字書（1994）朱鳳玉《敦煌寫本碎金研究》（1997） 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之一（1989） 敦煌字書緒論（1990） 敦煌寫本「碎金」系字書初探（1990）等。朱鳳玉 論敦煌本《碎金》在詞彙學上的意義（1996）、朱鳳玉 論敦煌本《碎金》與唐五代詞匯（1996）， 敦煌寫卷《俗務要名林》研究（1993），除了對敦煌文獻中的字書作了全面普察、敘錄與分類外，也進行各個別字書與個別問題的整理與探究。

音韻方面，有關韻書的資料，最多也最早受到注意的則推《切韻》殘卷。潘重規的《瀛涯敦煌韻輯新編》（1969）是臺灣地區整理敦煌《切韻》規模最大的一部，謚正姜亮夫《瀛涯敦煌韻輯》錯漏二千餘條。林炯

陽 敦煌韻書殘卷在聲韻學研究上的價值 (1986) 則是通論敦煌韻書的聲韻價值, 其他殘卷的校勘則有龍宇純 英倫藏敦煌《切韻》殘卷校記 (1961), 潘重規 龍宇純英倫藏敦煌《切韻》殘卷校記拾遺 (1983), 姚榮松 巴黎所藏 P.2011 王韻的新校記 (1995), 孔仲溫 敦煌守溫韻學殘卷析論 (1986)。

有關聲韻的, 則有許世瑛 論《秦婦吟》用韻 (1968), 羅宗濤《敦煌變文用韻考》(1969), 林炯陽 敦煌寫本王梵志詩用韻研究 兼論伯三四一八號殘卷的系統 (1991), 王忠林 敦煌歌辭用入聲韻探討 (1991), 謝佩慈《敦煌詩歌用韻研究》(1999) 等。洪藝芳 唐五代西北方音研究 (1995) 從敦煌通俗韻文看唐五代西北方音的韻類 (上) 陰聲韻 (1995) 論《俗務要名錄》所反映的唐代西北方音 (1996) 則是運用敦煌資料論述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系列論著等。

有關語法研究的, 主要有王錦慧《敦煌變文語法研究》(1993)、《敦煌變文與祖堂集疑問句比較研究》(1997), 曾蕙蘭《敦煌變文否定詞用法探析》(1998), 洪藝芳《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量詞研究》(2000)。

敦煌文學: 通論方面有鄭阿財的《敦煌孝道文學研究》(1982) 分析敦煌遺書中的孝道作品, 論述唐代儒釋道三教與孝道的關係, 探討敦煌孝道文學形成之因緣與旨趣。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1984), 就敦煌俗文學作品, 進行全面探討, 使唐五代俗文學史的研究獲得通盤性的瞭解。

敦煌寫卷中的文學作品有歷代的詩文集, 但最具特色且最受學界關注的則是其中的俗文學作品, 舉凡敦煌曲子詞、雲謠集、通俗白話詩、變文、敦煌賦等等, 都是此段期間的論述焦點。茲舉其要者, 述之如下:

有關變文的, 主要有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1983), 則以《變文集》為基礎, 一一覈校原卷, 進行訂正、補充, 不僅增添舊書以外的新材料, 也提出個人的新說法。對於學人研究和參考, 提供了最方便, 最正確的材料。新書並增收了列寧格勒、臺北中央圖書館以及日本龍谷大學所藏的變文八篇, 書後更附錄有「敦煌變文論文目錄」、「敦煌變文新論」及「圖版」, 現已取代《敦煌變文集》而為研究變文者的文本依據。

又變文自發現以來, 稱呼不一, 或稱佛曲, 或叫俗文, 或稱通俗小說, 或叫唱文, 直至鄭振鐸以「變文」稱此類講唱體的俗文學作品, 變文始成為中外

學者所普遍接受而確定的稱呼。但近年來有以此類作品體制、內容、性質不盡相同, 因而主張應將不同類型之作品加以區分, 不可統稱為變文。潘重規 敦煌變文新論 (1979), 舉出《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九提及的《報恩經變》一部, 應是《報恩經》的俗講經文, 可見「講經文」也可稱為「變」。而列寧格勒的《雙恩記》, 內容即《報恩經變》, 則變文亦可稱「記」。是知變文是一時代文體的通俗名稱, 實質便是故事; 講經文、因緣、緣起、詞文、詩、賦、傳、記等乃其異稱。此論實具力挽狂瀾之功。

另外, 羅宗濤的《敦煌講經變文研究》(1977), 除對敦煌講經的起源與講經文的體制進行探討外, 並考訂各篇作品的時代與題材。而 敦煌變文中詩歌形式之探討 (1981)、 敦煌講經變文與講史變文之比較研究 (1983)、 賢愚經與祇園因由記、降魔變文之研究 (1980) 等, 對後來研究變文者多所啟迪。

至於利用變文, 或單篇探究; 或據同類析論; 或運用故事主題系統考索, 成果相當可觀。主要如潘重規 敦煌押座文後考 (1982)、 敦煌寫本最完整的一篇講經文的研究 (1989)、 變文雙恩記試論 (1973), 羅宗濤 佛經注疏與講經文之比較研究 以維摩詰講經文持世菩薩第二為例 (1986)、 賢愚經與祇園因由記、降魔變文之比較研究 (1980), 鄭阿財 敦煌寫本父母恩重經研究 (1983), 陳祚龍 從敦煌古抄「葉淨能詩」談到凌濛初的「唐明皇好道集奇人」與「武惠妃崇禪鬥異法」(1988), 鄭阿財 敦煌寫本「孔子項託相問書」初探 (1990), 蕭登福 敦煌寫卷 唐太宗入冥記 之撰寫年代及其影響 (1985) 等。又撰寫學位論文的, 如宋新民《變文因緣類研究》、雷張瑞芬 伍子胥變文及其故事之研究、林隆盛 敦煌話本研究、王玫珍 敦煌俗文學十六篇研究、井康玉《敦煌史傳故事研究》等。

此外, 對敦煌文獻中的佛教靈驗記一類的準小說進行全面系統的整理與研究的主要有鄭阿財 敦煌寫卷《釋智興鳴鐘感應記》研究 (1995)、 敦煌本《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綜論 (1995)、 敦煌寫卷《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初探 (1996)、 論敦煌寫本《龍興寺毗沙門天王靈驗記》與唐五代的毗沙門信仰 (1996)、 敦煌靈應小說的佛教史學價值 (1997)、 敦煌寫本道明和尚還魂故事研究 (1998)、 敦煌佛

教靈應故事綜論（1998）等一系列的研究，除考察寫本的性質、時代外，校理寫卷文本之外，並結合敦煌壁畫、絹畫、佛教文獻以及民間故事等，以觀察佛教經典與信仰的流傳與演變，開闢了敦煌文學的另一片園地。

敦煌詩歌方面，潘重規《補全唐詩新校》（1981）據敦煌原卷一一校訂，使據敦煌殘卷補全唐詩的工作更臻完善。而黃永武的《敦煌的唐詩》（1987）、黃永武、施淑婷的《敦煌的唐詩續篇》（1989）則是敦煌寫卷中唐詩篇研究的典型。此外，楊明璋《敦煌世俗詩歌研究》（1999）對世俗詩歌有較全面的探討。

敦煌寫本白話詩人王梵志及其詩篇是海內外敦煌詩歌研究的熱門論題。潘重規的《王梵志出生時代的新觀察——解答全唐詩不收王梵志詩之謎》及《敦煌王梵志詩新探——據文獻記載，證以 P.4987 號王道祭楊筠文而推知王梵志出生時期，最遲在隋代晚期，而認定王梵志是隋代人，是《全唐詩》編者不收錄《王梵志詩集》的真正原因。朱鳳玉《王梵志詩研究》（1986），對王梵志詩進行全面整理與研究。網羅散布在英、法、日、俄等地的王梵志詩寫卷，逐一敘錄整理。並就有關內證與外證資料，探討其時代及生平，考究王梵志詩集的系統，析論王梵志詩的思想，探討王梵志詩的特色。兼論王梵志詩與後世文學的關係。校注篇對輯錄所得的390首詩，逐一核校並加註釋，提供有關王梵志詩研究較完整的資料，並恢復王梵志詩集的原貌。朱鳳玉《敦煌寫卷 S.4177 號殘卷校釋》（1987）將 S.4277 與俄藏 L.1456 法忍抄本王梵志詩加以綴合，則是重大發現。

秦婦吟，乃唐韋莊記黃巢寇亂以來之實錄，其詩萬口傳誦，後世失傳，幸賴敦煌石室保存得以不墜。因此頗受詩學研究者的關注，論述頗多。主要有潘重規的《敦煌寫本秦婦吟新書》（1984），通觀今存 16 個寫卷，博稽眾議，細覈原卷，考定異文，手寫一遍，並擷錄諸家注釋，兼陳己見，此篇堪稱秦婦吟研究之總結與定本。簡恩定《論韋莊「秦婦吟」中的寫作特色》（1986）、廖素卿《試探韋莊秦婦吟之思想內涵與寫作藝術》（1989）等，則是文學藝術的探究。

又敦煌陷蕃詩研究，也是利用敦煌詩歌研究較具特色的課題之一，主要有潘重規的《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研究》、《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及《續論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1987）等。

有關曲子詞方面，主要有潘重規的《敦煌雲謠集新書》（1977）、林玫儀的《敦煌曲詞證初編》（1986），提供了敦煌曲較為完備而正確的文本。研究方面主要有林玫儀的《敦煌曲在詞學研究上的價值》（1986）、《研究敦煌曲子詞之省思》（1990）、邱燮友《唐代敦煌曲的時代使命》（1986）、王忠林的《敦煌歌辭中「征夫怨」辭析論》（1990）等。

除了變文、詩歌、曲子詞外，敦煌賦卷的結集整理也是新的論題。主要有潘重規《敦煌賦校錄》將分別度藏於各地的敦煌賦卷，一一檢閱，細心推勘，得其文理，彙鈔含校，此乃敦煌賦的第一次結集。另有陳世福的《敦煌賦研究》、簡宗梧《俗賦與講經變文關係之考察》（1996）、胡幼峰《敦煌殘卷劉希夷供詩「死馬賦」的寫作特色》（1989）等篇章。

此外，朱鳳玉《敦煌文獻中的廣告文學》（1998），以敦煌出土文獻發現的商舖叫賣廣告詞和通俗讀物如《碎金》、《崔氏夫人訓女文》廣告詞為研究對象，推論此應為現存最古老的廣告文獻。

有關傳統集部的研究，則有潘重規《唐寫文心雕龍殘本合校》（1970），擷錄諸家題記，詳列校文，並附原卷攝影，以闡明唐寫本之勝處，並祛學者疑惑。

經學：在文學以外的典籍的整理與研究方面，由於經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重心，因此自來學者對敦煌文獻的研究也莫不以經部要籍為先。在《尚書》的整理與研究，以陳鐵凡最具系統。如《敦煌本尚書述略》（1961），介紹了敦煌遺書中的 29 件《尚書》寫本，敘述內容、行數、抄寫年代等。《敦煌本虞書校證》（1963）、《敦煌本夏書校證》（1965）、《敦煌本商書校證》（1965）和《敦煌本虞夏書校證補遺》（1969）等則是將敦煌本《尚書》持與傳世版本進行校錄。《敦煌本尚書十四殘卷綴合記》（1969），在王重民所做研究工作的基礎上，將已斷裂為 214 件的敦煌本《尚書》重新綴合為五卷。

詩經方面，潘重規於 1967、1968、1969 年，遍校英法所藏敦煌詩經卷子，撰成《巴黎藏伯二六六九號敦煌毛詩詁訓傳殘卷題記》、《巴黎倫敦所藏敦煌詩經卷子題記》、《王重民題敦煌卷子徐邈毛詩音新考》、《倫敦斯三七三九號暨列寧格勒藏一五一七號敦煌毛詩殘卷綴合寫定題詞》、《倫敦斯一號敦煌毛詩傳箋殘卷校勘記》。1970 年結集成《敦煌詩經卷子研究論文集》，經由

敦煌所遺詩經卷子說六朝唐代詩學之風氣與詁訓傳之舊式。

春秋方面，陳鐵凡《法京所藏敦煌左傳兩殘卷綴合校字記》（1970），將兩件敦煌本《左傳》綴合為一卷，並與今本進行校勘；《左傳節本考》（1970），對敦煌節本《左傳》進行了考證。

孝經方面，陳鐵凡《孝經鄭注校證》（1987）及相關論文，最具代表。根據敦煌遺書中所保存的4件鄭注抄本及3件孝經注疏會合清人輯佚所得，作為校證，為目前最完備之孝經鄭注。潘重規《簡論幾個敦煌寫本儒家經典》（1986），則論述敦煌卷子P.3378《孝經注》殘卷，雜引故事發揮經義，所引故事頗似小說家言，顯係《孝經》注的儒生受佛教俗講風氣之影響，而採取佛教用故事講經的方法注經。陳金木《敦煌本孝經鄭氏解義疏作者問題重探》（1990）則推論此卷之性質為疏釋鄭氏解之作，係天寶元年以前之孝經學者所為。

論語方面，主要有陳鐵凡《敦煌本論語彙考》（1961）、鄭靜若《論語鄭氏注輯述》（1981）、陳金木《唐寫本論語鄭氏注研究》（1996）。

子部：類書與蒙書的研究是其中的一大特色。類書方面，以王三慶最具成果，《敦煌類書》（1993）、《敦煌古類書語對研究》（1985）為其代表。前書網羅敦煌寫卷中的類書資料，分類校箋，貢獻頗多。蒙書方面，主要有鄭阿財《敦煌蒙書析論》（1990），全面普查敦煌蒙書，進行分類，逐一考訂、並分析其特質，評估其於中國蒙書發展史上之價值。而周鳳五《太公家教研究》（1986）、朱鳳玉《敦煌寫本「太公家教」研究》（1986）、《敦煌通俗讀物「新集嚴父教」研究》（1986）、《敦煌寫本雜抄研究》（1988）、鄭阿財《敦煌寫卷「新集文詞九經抄」研究》（1989）等，則是個別蒙書的整理與探研。

史地：在史籍的整理與研究方面，主要的有：喬衍琯《敦煌卷子本史記殘卷跋》（1958）、蘇瑩輝《敦煌寫本國語解殘卷》（1961），嘗試對敦煌本《國語解》的本源進行推究。饒宗頤《孫盛晉春秋及其傳之外國考》（1986）論述P.2586殘卷乃孫盛《晉春秋》，非鄧聚《晉紀》；並據以考其「傳之外國」之情形。康世昌《孔衍春秋後語研究》（1988），網羅敦煌寫卷中的《春秋後語》，持與歷來輯錄彙校；並探討此書之性質、內容、體例、流傳與價值。汪治平《虞世南帝王略論研究》

（1989）除敦煌本及金澤本外，更全面爬梳典籍引用《帝王略論》資料輯校成編，據以探討此書撰作之方法、體例、成書年代、主要思想及其價值。

此外，毛漢光的《敦煌唐代氏族譜殘卷之商榷》（1971），從社會史角度考察了北圖藏《姓氏錄》和英藏《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分析有關族譜標準論爭的社會意義。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1986），則利用敦煌蒙書與學郎、學校等資料，探討敦煌的教育制度。有關西北歷史的研究，最重要的是瓜沙史事的探索，蘇瑩輝陸續發表有關論文達數十篇。如《論唐時敦煌陷蕃的年代》（1961）、《再論唐時敦煌陷蕃的年代》（1964）、《論敦煌縣在河西諸州中陷落最晚的原因》（1970）、《瓜沙史事繫年》（1963）、《巴黎藏石室本歸義軍節度使曹義金四疏箋證》（1986）、《瓜沙曹氏稱王者新考》（1986）等，均分別收入《敦煌論集》（1969）、《敦煌論集續編》（1983）、《瓜沙史事論叢》（1983）中。研究成果均有廣泛的影響。

宗教：以佛教方面為主。有關佛教禪學問題，主要有胡適依據西方學者新發現的資料和有關研究成果，對神會的《壇語》、《定是非論》做了新的校訂，收入新版《神會和尚遺集》（1968）。饒宗頤《王錫頓悟大乘正理決序說並校記》（1970）據新發現的漢藏資料，探索禪宗入藏的歷史、地理、年代等問題。冉雲華《敦煌卷子「大乘禪門要錄」研究》（1986），以為中央圖書館藏133號乃目前所知宗密著作的最早目錄，無論對禪宗思想史，或宗密的著作而論，均具重要意義。《敦煌寫本「禪源諸詮集都序」對中國思想史的貢獻》（1987）專就禪源諸詮集都序論述宗密撰寫中國禪史和編輯禪宗文獻時的思想內容和原則，以及內容編排的標準與理由，以說明其對中國思想史之貢獻。潘重規《敦煌六祖壇經讀後管見》（1992），旨在說明敦煌本《壇經》，是接近於六祖原本的抄本。並詳舉力證駁斥胡適之主張《壇經》為神會偽造的謬說。而《敦煌寫本《六祖壇經》中的「獠」（1992），以為「獠」字實乃「獵」之寫俗，「獠獠」連為一詞，蓋始見於壇經寫本，惟非為西南夷之一種，乃田獵之獠夷。又《壇經新書》（1994），敦煌寫本《壇經》只有一萬二千字，惠昕本則有一萬四千字，而明藏本竟增至二萬一千字，足見後世壇經版本，不乏後人增補。近代發現的敦煌本，正可讓世人重睹《壇經》原貌。唯以敦煌本俗寫文字不易確認，致使

真本不彰，乃據北京 8024 號、英倫 S.5475 號及敦煌博物館與大谷光瑞等之敦煌本《壇經》，細為校定，並工楷手錄定本，力求恢復《壇經》原貌，提供研究禪宗歷史與《壇經》者重要正確而可靠的資料。此外釋果樸《敦煌寫本 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1998)等。

另外，潘重規的敦煌寫本《眾經別錄》之發現(1979)辨明此卷應是 P.3847，非王重民所謂 P.3848。更論述《眾經別錄》每經必詳辨其文質、必揭其宗旨之特色，此卷之存在乃經錄一大發現。汪娟《敦煌禮懺文研究》(1996)，則是敦煌佛教研究的新課題。梁麗玲《六朝敦煌佛教的供養功德觀》(1999)。

道教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老子道經想爾注》。陳世驥「想爾」老子道經敦煌殘卷論證(1957)，認為「想爾注」乃張魯所為，其性質是道教初期一派的教門聖典。柳存仁《想爾注與道教》(1990)據 S.6825《老子想爾注》殘卷論述道教與《想爾注》間錯綜複雜之關係並提出時代之參證。其他道教經典研究有鄭阿財《論敦煌本「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道要品第四」的成立與流行》(1997)，論證此經的成立乃是道教徒為與佛教專經興起相抗衡，就原有涉及孝道的道經進行模仿改易而成。

此外，利用敦煌文書進行有關道教史的探討，主要有柳存仁《「三洞奉道科誡儀節」之推測》(1986)，陳祚龍《看了兩種模擬偽造的敦煌唐抄道經以後》(1989)，李豐楙《唐代「洞淵神咒經」寫卷與李弘一兼論神咒類道經的功德觀》(1990)，蕭登福《從敦煌寫卷中看道教星斗崇拜對佛教之影響》(1990)，敦煌寫卷《佛說淨度三昧經》所見的道教思想(1995)，敦煌

寫卷及藏經中所見受道教影響的星壇及幡燈續命思想(1996)，周西波《敦煌寫卷 P.2354 與唐代道教頭投龍活動》(1999)，鄭阿財《從敦煌文獻看唐五代的玄武信仰》(2000)等。

景教研究方面，則有梁子涵《敦煌景教之文獻》(1957)、《唐代景教譯經考》(1963)及張德麟《敦煌景教文獻「尊經」中的一些問題》(1989)等，對敦煌遺書中的景教文獻作了介紹、說明和校錄，探討唐代景教經典漢譯的情形。

石窟藝術：由於莫高窟在大陸，受限於地理環境及政治，敦煌壁畫、塑像的研究所能憑藉的資料僅有少數大陸與海外出版的圖錄，研究相當困難。因此早期只有概論介紹，而乏研究論著。1990年前後，隨著兩岸的開放交流，有系統大型的精印圖版印行，研究論著漸出。其中主要有蘇瑩輝《從飛天伎樂看莫高窟榆林窟的繪塑藝術》(1986)、《唐三彩與敦煌彩塑》(1988)、《敦煌早期的壁畫源流》(1990)、《略論莫高窟各期壁畫的技法與風格》(1990)、陳清香《敦煌藝術壁畫解析》(1988)、《敦煌壁畫中的維摩經變》(1990)、吉星台《敦煌早期壁畫風格初探》(1989)、李玉珉開始有系統進行經變與洞窟的個別研究如《敦煌藥師經變研究》(1990)、《敦煌四二八窟新圖像源流考》(1993)、《敦煌莫高窟259窟之研究》(1995)、掀起藝術史、佛教藝術的學位論文的浪潮。如黃幸惠《唐代初期敦煌莫高窟的西方淨土變》(1992)、陳慧宏《敦煌莫高窟早期的千佛圖》(1994)、楊懿恭《唐代敦煌法華經變研究》(1996)、葉佳玫《敦煌莫高窟四二八窟研究》(1996)、陳慧珠《敦煌涅槃經變的研究》(1998)等。

## 漢學研究 CHINESE STUDIES

《漢學研究》為一國際性學術期刊，園地公開，歡迎海內外學者賜稿。凡有關中國文史哲研究之中文論文或書評，未曾發表者，均歡迎惠稿。如屬會議論文，請先查明並無出版論文集之計畫。

來稿請不超過二萬五千字至三萬字，英文稿件不超過A4紙三十張為原則。書評不超過六千字或A4紙八張，並以近三年出版新書為主。

請附個人簡介。

文章出版後將致贈稿酬、四十五冊抽印本及二冊足本。

投稿請寄至本刊編輯部，電話：02-2314-7321；傳真：02-2371-2126；E-mail：lckeng@msg.ncl.edu.tw